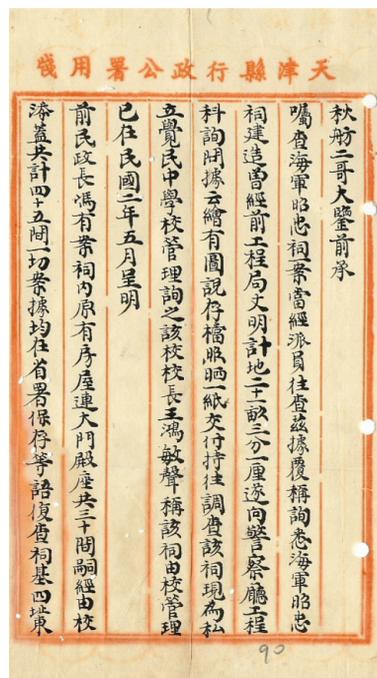




1922年起,马江昭忠祠内就供奉着两个神位:甲申海战忠勇殉国烈士之牌位、甲午海战忠勇殉国烈士之牌位。



1920年,天津县行政公署回复有关北洋海军昭忠祠的调查文函。

甲午
遗事北洋海军
天津昭忠祠建造记
(上)

壹 幸存将领 申请为死难战友建祠

有关天津海军昭忠祠,在目前可见的史料中只模糊闪过,详细史料保存在海峡对岸的台湾。

台湾的一位学者在发现这批史料后,曾对此进行过披露,让我们得以借此厘清这座昭忠祠的历史。

有关天津北洋海军昭忠祠的设立,目前所见最早记录此事的文献是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九日(1904年9月28日)的一份《事略》,由时任署理长芦盐运使陆嘉谷与存祀道冯汝霖共同署名撰写。

依该事略所载,设立该祠的缘来自时任参谋水陆军务处叶祖珪(1852-1905)提督,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光绪二十年八月(1894年9月)间大东沟中东一役,海军奋力迎击血战逾三时之久,……阵亡各员弁,均已蒙前北洋大臣李奏请分别恤恤,惟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忠勇惟成一时称叹,且官阶较高,并奉旨予谥壮节,予以建专祠各在案。……提督自荷天恩统率北洋海军数年来,深知海军规模尚未恢复,经费亦不充裕,尚未敢以捐建专祠为请,然该事经定案,若历久不辨,上无以宣朝廷优异之恩,下无以劝将士将来之志,抚衷追念引疚良多。前蒙宪台慎重轸恤,有整顿海军之意,因此拟请就在天津建立邓世昌公专祠,并将大东沟一役死难各管带员弁附祀其中,署曰“北洋海军昭忠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员春秋致祭。另于祠旁搭盖海军公所,作为全军员弁因公来津办公之处。有经费倘于海军各船历年截项下项下提拨,当属有盈无拙,理合备文并绘具图式,详恳宪台飭下工程局,择地估工,按地亩之文数,再定祠所房屋之大小尺寸。报竣后由提督查明所有死事,将各将士开列衔名送请刊刻木主,择日入祀。……择地建立海军昭忠祠并搭盖海军公所所在何处,建造需工款若干,候将式札发海防支应局,派委勘估妥议……

叶祖珪,甲午海战时任主力舰靖远舰管带。甲午战后,1899年被清廷重新启用,肩负起重建海军的大任。他也是晚清首位统领全国海军的“总司令”。

因为是一场败仗,甲午阵亡将士有意无意在甲午战后遭遇遗忘。作为北洋老将,叶祖珪看到死难战友无处祭祀,“抚衷追念引疚良多”。

文稿中还说,建海军昭忠祠是奉之前的“御旨”办理,为主祀邓世昌,其他殉难者陪祀,这意味着北洋海军昭忠祠是一所功臣专祠。

但目前尚未见到清廷对建邓世昌专祠的相关谕旨,只是在邓世昌殉国后,下诏“入祀京师昭忠祠”。

不过在黄海海战后,给邓世昌建专祠的呼声一度很高。

甲午战争刚结束时,京官杨道霖曾有一份《甲午奏疏》,据其年谱记载,当时是多人联名上书。

在这份奏疏中,杨道霖提到“于威海海军公所改祀邓世昌祠”。

杨道霖,江苏无锡人,17岁时童子试以第一名入洋,36岁考得进士。他先后应洋务派著名人物盛宣怀、张之洞的邀请,办理洋务。

当时主战派的重要人物文廷式,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中旬(1894年10月),也就是黄海海战爆发一个月后,上《请飭海军迅图出洋及任汉诺根祀邓世昌片稿》,文中写道:副将邓世昌,殉难勇烈,洋人慨慕,至铸铜像之。可否请旨,准予威海卫为建专祠,以昭激励。

这两封奏折都提到是在威海为邓世昌建专祠堂。

此外,叶祖珪还提到,“由提督查明所有死事,将各将士开列衔名送请刊刻木主。”这是否意味着叶祖珪或有重新调查海战的举动,从而形成一个殉难将士名单。在甲午战后10年,这份名单是否会比当年李鸿章上报抚恤名单有所增加呢?

叶祖珪是北洋海军幸存的几位高级将领之一,他对海军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生前始终带着当年靖远舰专用,印有靖远舰徽的茶匙,并多次对家人及左右说“看到这茶匙,好像靖远还在我身边”。

叶祖珪来做这件事,于情于理都非他莫属。

贰 耗时五年 建祠从发议至购地待建

当时叶祖珪将报告提交后,陆嘉谷与冯汝霖觉得对于昭忠祠择地何处,应购地多少亩,叶祖珪均未详细说明。于是函文询问,叶祖珪复称在天津银元局后面有地一区,可以做为搭盖祠所之用。

根据该论文里提供的信息,此后工程局指派委员翟成一,依叶祖珪所提供的图式逐细勘估,旋因该员病故,未能估计,遂改由陈汝豫承盖。但当时陈汝豫同时办理新马市房及李文忠公祠工程,业务繁重,无法兼顾,于是另外派员会同叶祖珪按图数核,丈量建房屋间数及应需工款若干,据估计造具详细估册后,复行工程局核办。

但在《事略》中,有关地或工程图式的资料并未收录。

1905年夏,叶祖珪在巡视沿海炮台及水雷营时,因劳累过度又染伤寒,在上海军中病逝,年仅53岁。

叶祖珪的去世,导致海军昭忠祠的建设一度停止。

直到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1908年4月17日),《事略》记载:“仅将丈买海军公所、海军昭忠祠、海防营务处基地亩数,按照成案,核实地价,并自行迁坟……”其中还记录了各分项工程所需银两。

由此可见,天津北洋海军昭忠祠真正启动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整个形制也是依照此前在天津所建的淮军昭忠祠形式,将会馆、公所、祭祀三功能合而为一。

在宣统元年二月初九日(1909年2月28日),北洋海防营务处曾就此向时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杨士骧(1860-1909)有一次汇报,汇报稿中提及:

建造北洋海军昭忠祠,系前北洋大臣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1907年6月24日)拟定候行,并奉袁世凯面谕,在营务处公园北界第九十九段地内,由海防支应局派员购地,由海防支应局派员陆葆泰与代理天津县知县孙鸿烈,丈买该处基地一圈二十余亩,作为筹建海军公所基地之用。天津县工程局欲扩充马路,将所购海军公所基地内地北划一路线,由中间穿过,该购地一经割裂土地遂变得畸零,连造各次房屋所需的基地也就不敷使用。

北洋海防营务处认为,工程局所辟的马路影响到昭忠祠的修建,虽一面有路可通,而一面靠着公园墙界,并非大道,又非贸易市场,尽可易地修筑,因此建请北洋大臣飭下工程局将该处马路改道修造,以利海军公所房屋可以兴建。

但该汇报稿也表示:“若该地为马路所必经之处,不能他移,海军公所多项房屋建筑用地势必不敷使用,可以考虑另外择地建造。”

因此建造北洋昭忠祠一事,又有所拖延。建祠从发议至购地待建,至此最少已经五年。

叁 款项挪用 兴建规模不得不缩减

北洋海防营务处设在天津,是北洋海军重要的支持机构。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筹办海军,因此设立营务处。

在建祠土地已经购买妥当后,北洋海防营务处继续推动此案。

据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910年5月6日)海军又一《事略》续载:

前据请建海军昭忠祠并附盖海军公所及海防营务处等房屋一案,于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间,经原任广东水师提督在北洋参谋水陆军务处差次,详蒙前北洋大臣袁批行海防支应局议,由海军历年所缴截旷银两项下挪拨用。……前北洋大臣袁于公园迤北亲履勘订定地基,由支应局飭派购地委员侯补知县陆葆泰、前署天津县知县章程会同丈买,计地二十一亩有零,于光绪三十四年夏间始行。……原居中建海军昭忠祠,其左附盖海军公所为接待各国外宾并联军拜见酬酢,以及海军人员因公来津停顿之用,其右附盖海防营务处,以免租用民房以资办公。

此案经北洋大臣杨士骧面谕同意准如原议,但营务处与海军公所则并为一处。所以北洋海防营务处改丈绘估,以三易为二,原购地股本合宜,但因事故相寻歧,购地既久迄未兴工。

《事略》中提到,当年袁世凯“亲履勘订定地基”。

对于北洋海军,袁世凯也有一份交集。

光绪末年,接替叶祖珪统领海军的萨镇冰等部分北洋海军旧属和威海卫当地绅民三百多人,联名上书袁世凯,要求给已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公正的评价和待遇。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1906年7月5日),袁世凯以《故提督丁汝昌恩开复原官原衔折》名,转奏朝廷,只是当时未获允准。

该《事略》还称:前募建昭忠祠等屋宇,经支应局调查,原尚存前截旷银七万两左右,嗣因改拨他用仅存三万两有奇,际此时艰,若如原议,何从另筹补款。拟请先其所急,尽前项存款就所购地一段,垫基合筑围墙,居中先建昭忠祠一座,其余海军公所、营务处等房日后

有筹到款,再行接造。

从上述记载可知,虽然建祠动议早已定下,但因拖延历时太久,原款项一部分已遭挪用,以致兴建规模不得不缩减。

海军营务处于宣统二年六月十六日(1910年7月22日)重派委员甘联□、参事□道华前往该地逐项勘查,按照昭忠祠仪礼应有之制核实估计后,于次月间终于上呈建筑图式,九月初四(1910年10月6日)经批定后,正式开始建造。

根据记载,昭忠祠规模颇为可观:大门一座三间,垂珠门一座一间、正屋一座三间、露台一段、前院东西厢房并后院两厢四座十二间、后院祭器库二座六间、大门左右耳房一座六间、游廊走廊七间、方砖甬路六段、白石碑二座、大门外白石狮子一对、照壁一座、石甬路一段、口甬路二段、围墙一百六十三丈等。总计需宝银二万五千七百七十七两余。

此时距叶祖珪发议之际已历经七年有余。

关于海军昭忠祠的建造过程,宣统三年四月初六(1911年5月4日)的《中报》上曾提到过此事。

这篇报道的题目叫《盐商之大蠹》。大意是说,时任长芦盐运使张镇芳要升任湖北提法使,但原直语议局以本省盐商拖欠欠洋债为数甚巨,恐后任办理稍欠妥善,贻累全省人民,因此要求镇芳将此事办理完结再赴新任。《中报》记者调查发现,张镇芳之所以放任盐商大借外债,主要是听信了他的几个儿子黄某某的话。黄某某人称黄四爷,“于数年前本一无赖,自认张运司为义父后,言听计从,异常乖顺。”此后报道历数黄四的恶行。其中在“黄四之权力”一节中写道:

北洋向无海军,闻此次之建设海军昭忠祠,黄之无形主力居多,盖其兄曾充海军炮兵数年,前因病身死,欲附祀也。闻海军部以值此国库支绌海军需款之际,不欲糜款建祠,然部议无效,刻已开工矣。

很显然,报道中将海军昭忠祠的建设归功于黄四,是有夸大之嫌的。但从报道的时间看,此时海军昭忠祠左右在建设之中,开工已有7个月左右的时间。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心健康(53) 本栏目由嘉事馨顺和特约刊出

多学科联手,对付高血压这个“无声杀手”

本期嘉宾: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刘凯

“高血压”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之所以“无声”是因为可以没有任何症状而被忽略。“杀手”则是你对它轻视的回应。长期的血压增高可加重动脉硬化的进展,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肾功能不全等发生。然而,医生每天依然能够听到“高血压没得事,没啥子不舒服就没管它”这样的回复。

高血压是全球疾病负担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也是重要的心血管疾病,有很高的致残率、致死率,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并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沉重负担。《2018年四川省人群健康状况及重点疾病报告》全省18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7.31%,推测我省高血压患病人群达2200万。知晓率30.89%、治疗率26.61%。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率先于2018年6月成立以心脏内科高血压亚专业为核心,同时纳入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内分泌科、肾脏内科、心理卫生中心、神经内科、老年科、心脏外科、全科、体检中心、康复中心、门诊部、急诊部、护理部、实验医学科、放射科、核医学科、营养科、药剂科、流行病学研究室等多科参与构建的“华西高血压防治中心”,心脏内科支部书记兼副主任陈晓平教授

任中心主任,打造紧密型高血压多学科合作团队,使疑难高血压诊治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推动高血压防治新技术开展;打造华西高血压慢病医联体,推行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模式,并利用信息化手段,探索高血压慢病管理模式创新,升级高血压慢病管理模式,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百姓。

目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华西高血压防治中心已获得中国高血压防治中心和国家级心血管病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四川省中心,成为中国西部区域高血压防治主要基地及一流中心。推动高血压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规范,优化高血压疾病防治策略,促使高血压疾病的综合健康服务模式构建及完善,提高高血压慢病防治体系质量,提升高血压科学研究的水平。

为提高患者对高血压危害的认识并取得高质量的管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高血压中心特开设高血压专科门诊,为初诊患者提供血压测量和高血压心脑血管等靶器官损害评估、高血压患者随访管理、继发性高血压筛查、难治性高血压介入治疗评估等工作。希望每一位高血压患者,都能得到最佳治疗。



封面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葱拍客得大奖